

北朝装饰纹样

〔韩国〕李姪恩著

故宫出版社



北朝装饰纹样

——五六世纪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

李妍恩〔韩国〕著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朝装饰纹样:5、6世纪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韩)李妍恩著. -- 北京:故宫出版社, 2014.8
(紫禁书系)
ISBN 978-7-5134-0339-9

I. ①北… II. ①李… III. ①石窟—佛像—石刻造像—纹样—美术考古—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879.2②K87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0799号

北朝装饰纹样——五六世纪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

著者: 李妍恩(韩国)

责任编辑: 朱 蓝

装帧设计: 李 猛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ccb@culturefc.cn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19.73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339-9

定 价: 86.00元

目录

序论	005
一 石窟寺研究的概况	005
二 装饰纹样研究的概况	011
三 研究的对象与研究意义	013
四 石窟寺装饰纹样的研究方法	016
第一章 石窟植物装饰纹样	019
一 卷草纹装饰纹样	020
二 莲花纹装饰纹样	039
第二章 石窟动物装饰纹样	055
一 龙纹装饰纹样	056
二 狮子纹装饰纹样	070
第三章 石窟飞天装饰纹样	077
第四章 石窟其他装饰纹样	097
一 火焰纹装饰纹样	098
二 联珠纹装饰纹样	110
三 兽面纹装饰纹样	118

第五章 石窟背光装饰纹样	127
第六章 石窟装饰纹样的发展阶段及相关问题	155
一 石窟装饰纹样的发展阶段	156
二 龙门石窟药方洞年代问题的探讨	170
三 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年代问题的考证	173
四 克孜尔石窟洞窟年代问题的考证	182
第七章 中国石窟装饰纹样的起源、传播及发展	187
一 植物装饰纹样	189
二 动物装饰纹样	220
三 飞天装饰纹样	230
四 其他装饰纹样	234
五 背光装饰纹样	246
结论	249
参考文献	253
附录	266

北朝装饰纹样

——五六世纪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

李妍恩〔韩国〕著

故宫出版社

目录

序论	005
一 石窟寺研究的概况	005
二 装饰纹样研究的概况	011
三 研究的对象与研究意义	013
四 石窟寺装饰纹样的研究方法	016
第一章 石窟植物装饰纹样	019
一 卷草纹装饰纹样	020
二 莲花纹装饰纹样	039
第二章 石窟动物装饰纹样	055
一 龙纹装饰纹样	056
二 狮子纹装饰纹样	070
第三章 石窟飞天装饰纹样	077
第四章 石窟其他装饰纹样	097
一 火焰纹装饰纹样	098
二 联珠纹装饰纹样	110
三 兽面纹装饰纹样	118

第五章 石窟背光装饰纹样	127
第六章 石窟装饰纹样的发展阶段及相关问题	155
一 石窟装饰纹样的发展阶段	156
二 龙门石窟药方洞年代问题的探讨	170
三 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年代问题的考证	173
四 克孜尔石窟洞窟年代问题的考证	182
第七章 中国石窟装饰纹样的起源、传播及发展	187
一 植物装饰纹样	189
二 动物装饰纹样	220
三 飞天装饰纹样	230
四 其他装饰纹样	234
五 背光装饰纹样	246
结论	249
参考文献	253
附录	266

序论

一 石窟寺研究的概况

中国石窟寺遗迹分布广泛，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不但对于考古学研究，而且对于历史、宗教、艺术、中外交流史的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中国石窟寺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 50 年代以前，主要以美术史研究方法为主，而且因当时各种条件的局限，所得调查资料较零散，缺乏对石窟寺遗存系统的了解及全面认识。自从 1950 年以来，利用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对石窟寺遗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研究^①，标志着中国石窟寺研究已进入现代考古学的范畴。

本文对石窟寺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论述在各阶段的研究成果，以及学者们对石窟寺遗存的认识过程。其划分主要以 1950 年之前为一个阶段，50 年代以后为另一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考古学的办法来

^① 有关中国石窟寺考古的研究史主要有以下文章：宿白：〈石窟寺考古的回顾〉，《文物》1979 年 10 期；温玉成、李玉昆：〈龙门石窟四十年研究回顾〉，《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 2 期；丁明夷：〈云冈石窟研究五十年〉，《中国石窟·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94 年；李力：〈中国石窟寺考古四十年〉，《世界宗教研究》1992 年 3 期；徐苹芳：《石窟考古的新成果——评〈中国石窟〉新疆和龙门卷》，《考古》1989 年 1 期，《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 年 2 期；李裕群：〈中国石窟寺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 年 9 期；刘建华：〈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五十年〉，《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 年。

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①。

[一] 第一阶段：

此阶段对中国石窟寺的调查和研究，滥觞于 20 世纪初，一些外国探险家和学者根据明、清地方志和有关游记中记录的线索，深入中国腹地，对河南、河北、山西、甘肃、新疆等省区的许多重要石窟进行探查，涉及了著名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以及新疆的拜城、库车、吐鲁番等诸石窟。外国人探查中国石窟的势头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

日本人伊东忠太在 1902 年调查了大同云冈石窟^②；法国人沙畹〔E·Chavannes〕从 1907 年开始调查了云冈、龙门、巩县和山东济南石窟造像^③；德国人勒科克〔A.Von LeCoq〕在 1902 ~ 1914 年之间四次到新疆考察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④；英国人斯坦因〔A.Stein〕1900 ~ 1916 年之间三次在新疆和敦煌莫高窟等地考察^⑤；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于 1906 ~ 1908 年之间考察了新疆和敦煌石窟^⑥；色伽兰〔Segalen〕考察了四川广元、巴中一带的石窟寺^⑦；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的大谷探险队于 1903、1909、1913 年三次到新疆考察

^① 关于 1950 年以来，以宿白为代表的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其创建过程与学术成果，已有人专门探讨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方法论，即把石窟寺研究纳入考古学的范畴内，利用考古学的方法——最基本的层位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与前代用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不同。还根据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和《敦煌七讲》阐述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整理出了四个研究程序：一、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二、洞窟、造像和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三、中国石窟寺分期分区的研究；四、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本文以上述观点为基础，即按照其方法论的不同把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徐苹芳：《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 年 2 期。

^② 参见〈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建筑杂志》第 189 号。

^③ 参见《北中国考古图录》，巴黎，1915 年。

^④ 著有《高昌图录》，柏林雷迈尔出版社，1913 年。

^⑤ 1900 ~ 1916 年，斯坦因〔A.Stein〕三次在新疆和敦煌莫高窟等地考察，主要专著有《古代和阗》1907 年、《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 年、《西域考古记》1921 年，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

^⑥ 1906 ~ 1908 年，伯希和〔P.Pelliot〕考察了新疆和敦煌石窟，主要专著有《敦煌石窟图录》，巴黎格特纳书店，1920 ~ 1926 年；《伯希和敦煌石室笔记》，1981 ~ 1986 年陆续出版。

^⑦ 参见《中国石窟图录》，巴黎格特纳书店，1923 ~ 1924 年。

石窟^①;20世纪20年代,瑞典的喜龙仁〔Osvald Siren〕多次到中原北方地区考察石窟寺造像^②;美国的华尔纳〔Landon Warner〕于1924年和1926年两次到敦煌和安西榆林窟等地考察,并发现了泾川王母宫石窟^③;1918~1924年,常盘大定、关野贞调查了中原北方和南方地区的石窟寺和佛教寺院^④;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京都大学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调查了龙门、响堂山石窟,并在云冈石窟进行了长达6年之久的调查、摄影和测绘^⑤。

中国学术机构和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1933年由中国学者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其中黄文弼等人考察了塔里木盆地的石窟寺^⑥;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徐炳昶等人调查了邺城地区的石窟寺^⑦;中国营造学社对龙门、巩县、响堂山石窟作了记录^⑧。40年代向达、张大千、谢稚柳、史岩、石璋如、常书鸿等人先后考察敦煌石窟,进行了研究^⑨。还有冯国瑞调查甘肃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⑩;也有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调查了四川、云南等地的其他石窟。

此阶段研究成果,首先在于调查石窟历史年代和艺术源流,而后逐渐研讨其排年分期和窟室类型,研究成果主要有伊东忠太〔日〕^⑪、沙畹〔E·

① 参见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记》,有光社,东京,1936年。

② 喜龙仁〔Osvald Siren〕多次到中原北方地区考察石窟寺造像,著有《中国雕刻》,伦敦,1925年。

③ 参见《中国西北考察记》,英国啊罗史蜜斯公司,1927年。

④ 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佛教史迹》,东京,佛教史迹研究会,1926~1927年。

⑤ 《龙门石窟的研究》1941年,《响堂山石窟》1937年,并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1951~1956年30册。

⑥ 参见《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⑦ 参见马丰:〈赴磁县武安县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工作报告〉;徐炳昶:〈唐王岐及宝山调查报告〉,均刊于《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7卷第4期。调查结束后又出版了《南北响堂及其附近石刻目录》,北平研究院,1936年。

⑧ 参见《刘敦桢文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

⑨ 其中石璋如先生于1942年在敦煌进行了测绘,1996年出版了《莫高窟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研究莫高窟洞窟形制的重要参考书。

⑩ 冯国瑞重新发现了麦积山石窟,参见《麦积山石窟志》,天水报社印刷厂重印本。

⑪ 《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建筑杂志》第189号。

Chavannes, 法^①、大村西崖〔日〕^②、松本文三郎〔日〕^③、小野玄妙〔日〕^④、关野贞、常盘大定〔日〕^⑤等人的论述。

稍后, 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⑥一文, 探索云冈建筑装饰的西方因素及其渊源问题。以上诸著也讨论了云冈历史, 但系统考证云冈史料工作, 以陈垣《记云冈武州山石窟寺》^⑦为最早。

在此阶段调查成果的基础上,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的《响堂山石窟》^⑧、《龙门石窟の研究》^⑨〔2卷〕、《云冈石窟》〔16卷〕, 是迄五十年代总结中国石窟寺研究的巨作。特别是《云冈石窟》〔16卷〕对此后石窟寺研究具有影响力, 该书第6卷序章《云冈石窟の谱系》〔1951年〕、第10卷序章《云冈様式から龙门様式へ》〔1953年〕、第11卷序章《云冈以前造像》〔1954年〕、第12卷序章《云冈雕刻の西方样式》〔1954年〕、第15卷序章《中国にわかる石窟寺院》〔1955年〕和第16卷总结《云冈造窟次第》等论文, 对云冈的源流、排年分期和窟室类型的研究, 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高水平^⑩。

这时期对于中国石窟寺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基本上都是以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的。但总算使人们对石窟寺有了初步的认识, 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第二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代以来, 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 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 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 为

^① 《北中国考古图录》卷二〔Mission archéologiques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II〕解说, 1915年。

^② 《支那美术史·雕塑篇》1915年。

^③ 《佛像の美术史的研究》, 《哲学研究》1卷1号, 1916年。

^④ 《极东三大艺术》, 1924年。

^⑤ 《支那佛教史迹》第二册解说, 1926年。

^⑥ 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梁思成全集》第二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年, 原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3、4期, 1933年。

^⑦ 陈垣:《记云冈武州山石窟寺》, 《东方杂志》第16卷2、3号, 1919年。

^⑧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 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 1937年。

^⑨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の研究》, 同朋舍, 1991年〔复刻版〕, 原刊于1941年。

^⑩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96年, 原载于《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1991年。

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石窟寺的调查、保护与发掘等基本工作，大致可以1966年为界，将中国石窟寺研究情况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为建国初期至1966年，主要进行了对全国各大石窟的初步普查和重点复查。1958年以前主要在普查；1958～1964年，进入重点复查和初步地全面使用考古学方法的时期：1964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伴随较大规模的维护工程，几个重点石窟都开展了遗迹的考古勘查和发掘工作。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主要是70年代至今，围绕各地石窟寺的维修工程，对石窟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清理及窟前遗迹和建筑的发掘清理^②。

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们得以将多年的工作研究成果系统整理出来，陆续以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公布于世。利用考古学方法，即地层学和类型学来调查、发掘、记录〔包括文字和图象〕石窟的全部内容，然后对窟形、造像、壁画等进行类型组合关系的排比和编年分期。对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克孜尔石窟等重要的石窟进行分期研究。

关于云冈石窟的分期，宿白先生新发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记的十寺，考证云冈石窟诸寺的历史。碑文一千一百余言，记述详细，徵引宏博，记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而引用现已失传的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③。然后，他运用石窟寺考古学的方法，科学、综合地考察了云冈石窟，写了《云冈分期试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② 5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石窟寺作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几篇文章如下：梁思成先生对敦煌石窟中反映的古代建筑作了专题研究，也对中国雕塑艺术史作了探讨。谢稚柳、潘絜兹等对敦煌的佛教艺术作了探讨。刘慧达先生所撰《北魏石窟中的“三佛”》和《北魏石窟与禅》两篇文章，对北魏石窟的三佛题材和三佛窟的演变作了分析探讨，并研讨了北魏石窟与禅修的关系和北魏石窟的性质。参见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卷第5期；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1957年；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刘慧达：〈北魏石窟中的“三佛”〉，《考古学报》1958年1期；〈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3期。

^③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1期。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论》^①,此文中把云冈石窟分为三期。其后,宿白先生又对云冈石窟分期的历史证据,作了充分的论证,写了《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②。还有《〈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③一文中,讨论了日本长广敏雄写的《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宿白氏の云冈石窟分期论を驳す》〕^④提出的异议,再详细地探讨了《金碑》的著录、发现和记事,护国寺、崇教〔福〕寺等有关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

关于洛阳龙门石窟的分期研究,宿白先生在《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一文中,将洛阳地区北朝石窟分为四个阶段。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洛阳北朝时代造型艺术包括佛教在内,是受了南朝的影响,洛阳地区石窟窟龛造像变化的原因,也应考虑到南朝的因素。这篇论文使石窟寺的研究与整个历史文化发展大势紧密相连,是石窟寺分期分区研究的典范。还有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年代》^⑤,此文据小龛造像和大像的类型,将唐代造像分成三期,根据各期题材的变化探讨了洛阳唐代佛教宗派流行的状况。温玉成《龙门北朝纪年小龛的类型、分期与洞窟排年》^⑥,据龙门北朝纪年小龛的类型推断了北朝洞窟的年代。还有《龙门唐窟排年》^⑦一文中,论述唐代开凿洞窟的分期与年代。

关于响堂山北齐塔形窟的研究,1956年王去非先生在《参观三处石窟笔记》一文中提到响堂山塔形窟。他明确提出了塔形窟龛的基本形状。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较多的注意。1957年宿白先生带领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在南北响堂山石窟实习,作了考古调查和勘测。1984年~1985年为了配合石窟加固和靠山阁的迁移工程中,在2窟前廊后壁窟门两侧龛内发现了隋

^① 宿白:《云冈分期试论》原载《考古学报》1978年1期。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②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原载《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1991年。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③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1982年2期。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④ [日]长广敏雄:《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宿白氏の云冈石窟分期论を驳す》〕,《东方学》第60辑。

^⑤ 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79年4期。

^⑥ 温玉成:《龙门北朝纪年小龛的类型、分期与洞窟排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⑦ 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

代《滏山石窟之碑》撰刻的碑记，碑文记述了南响堂石窟开凿的缘起、年代以及重修情况，这为确定南响堂石窟的开凿年代提供了确凿的证据^①。

二 装饰纹样研究的概况

迄今为止，在亚洲古代美术研究领域中，尚未有学者试图对装饰纹样的历史进行正式研究，这一主题仍是有待发展的诸多重要领域之一。在有别于亚洲美术的美术史的故乡——欧洲，由于作为美术史研究主要理论的程式化理论源于纹样研究，早在 20 世纪前后，纹样研究就对学术界的大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程式化理论的兴起，使人们对美术史的记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使对欧洲乃至世界美术史的关注开始达到高潮^②，纹样研究以外的美术史新研究领域也由此诞生。这一系列转变，具体表现在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欧洲列强对中亚艺术的探察和发掘，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欧列强开始大肆掠夺世界文化财产。20 世纪初，英国的斯坦因〔A. Stein〕、勒科克〔A. von LeCoq〕、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等在丝绸之路的心脏——中亚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促进了西欧考古美术史的研究。

20 世纪前后，初期程式化理论由李格尔〔Alois Riegl〕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主导展开。李格尔〔Alois Riegl〕集中关注了埃及莲花纹样的变迁问题，从中导出了程式化理论，并收集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希腊等地有关棕叶纹和莨苕叶纹的资料，对植物纹样的一般变化发展过程以及发达过程进行了研究。李格尔〔Alois Riegl〕的研究结果对帮助理解地中海地区的植物装饰纹样作出了贡献。此后，古德伊尔〔W.h.Goodyear〕对作为宇宙象征纹样的莲花纹和棕叶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李格尔〔Alois Riegl〕和古德伊尔〔W.h.Goodyear〕的纹样研究的差异向我们展示了纹样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即研究纹样的象征意义和研究纹样的演变过程。此

^① 本文中响堂山石窟装饰纹样的年代依据这次工作的报告。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文物》，1992 年 5 期。

^② 在欧洲，普遍认为作为世界美术研究一部分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有关方面最早的著述是由法国学者完成的。M. paleologue, l' Art Chinois, Paris, 1887.

外，根据程式化理论，众多的初期连续植物纹样得以分类^①。

西方学术界在李格尔〔 Alois Riegl 〕、古德伊尔〔 W.h.Goodyear 〕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东西方共存的植物纹样——莨苕叶纹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曾主导西方美术史研究的 otto kümme 在开始研究中国美术之前，就已经醉心于古代纹样史的研究，甚至留下了可以与李格尔〔 Alois Riegl 〕的纹样史相比肩的重大成就。在罗森〔 Jessica Rawson 〕的主导之下，对中国装饰纹样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成果产生于 1984 年，在大英博物馆进行了特别展出。与此同时，罗森〔 Jessica Rawson 〕的《 CHINE ORNAMEN -The Lotus and Dragon 》对中国装饰纹样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的介绍。^② 该书的附录《 lotus and papyrus designs in ancient Egypt, Mesopotamia and Greece 》阐述了从地中海的植物纹样中找到了中国植物纹样起源的发现。罗森〔 Jessica Rawson 〕强调她的研究在细部纹样上与李格尔〔 Alois Riegl 〕的研究分析有所不同，但对李格尔〔 Alois Riegl 〕的整体研究方法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和继承发扬。

亚洲对装饰纹样的关注，开始于 20 世纪初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对各地佛教石窟寺院的调查，其中包括对云冈石窟雕刻纹样的研究。其成果是在 1950 ~ 1956 年的《云冈石窟》全十六卷中的第四卷序文《云冈石窟装饰の研究》中对云冈石窟装饰纹样起源问题的试探讨。而且云冈石窟的装饰纹样特别强调了中亚石窟〔克孜尔石窟等材料〕对中国石窟的直接影响。^③ 关于纹样的传播路线，宿白先生认为：佛教从印度〔 Gandhara 等地区〕出发，经中亚丝绸之路，传播至中国。^④ 但他同时强调北魏统一中国北部后，使位于首都大同的云冈石窟担当了成为佛教美术的中心角色，从而使其逆向传播，即

^① Alois. Riegl, Stilfragen: Grundlegungen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Ornamentik, Berlin 1893, pp119-124

^② Jessica Rawson: CHINE ORNAMEN -The Lotus and Dragon-, New York, 1984.

^③ 对装饰纹样传播的具体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佛教美术传播的研究方面，以佛像中心的印度 Gandhara 样式向中国的传播过程已被整理出来。参考：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 4 卷 第 7 洞序文，《云冈石窟装饰の研究》和《云冈石窟》第 12 卷序文《云冈雕刻の西方样式》，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1952.

^④ 有日本学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是南方丝绸之路，但佛教是通过贯通中亚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这一说法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承认。有关中国初期的佛教参考：温玉成：〈公元 1 ~ 3 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敦煌研究》1999.1; 有关南方传来的主张参考阮荣春：〈初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艺术学》第四期，台北，1990 年 3 月。